



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

管窥集

明清史散论

朱诚如 著



紫禁城出版社



故宫博物院
学术文库

管窥集
明清史散论

朱诚如 著

紫禁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管窥集: 明清史散论 / 朱诚如著. —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1.10

(故宫学术文库)

ISBN 7-80047-358-9

I. 管… II. 朱… III. 中国—古代史—明清时代—研究—文集 IV. K24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7298 号

管窥集—明清史散论

朱诚如 著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400 千字 印张 22

200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册

ISBN 7-80047-358-9/K·167

定价: 55.00 元

2002. 5. 20

考古书店

努尔哈齐祖父图伦胡尔布图，死于战火。他在祖父即位后，^{（即）}“继祖父之志，仍厚结乡邻”（《筹辽方略》卷五《努尔哈齐》），并“时送所耕种人，自施于市”（^{（即）}《肇基记述》第七册，卷21），特制明道信位，先加加升都督职衔，奉封为都虎将军。努尔哈齐少年时代曾投在辽东李成梁部，^{（即）}“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山中闻见录》卷1），因此而与李成梁及其子李如柏结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人有说“建酋（指努尔哈齐）与成梁谊同父子”（《明神宗实录》卷58），亦有说“如柏兄弟与奴酋有香火之情”（《明神宗实录》卷580）。《国朝》作者谈迁则说，努尔哈齐“幼孤育于成梁，年十入建酋本部”（《国朝》卷83）。上述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究，但至少可以说，努尔哈齐与李成梁父子关系非同一般，而这种关系对于努尔哈齐的成长以及他对辽东汉区的了解却是至关重要的。努尔哈齐受汉文化影响很深，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早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有人就在通州文庙“见析（浙）江绍兴府会稽县



朱诚如 简历

朱诚如，江苏淮阴人，1945年8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本科毕业，山东大学历史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毕业。长期在高校任教，曾任辽宁师范大学校长、教授。1988年奉调故宫博物院，出任主持行政业务工作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中国紫禁城学会会长、宫廷史学会会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育部社科研究基地（中古史）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社科研究基地（清史）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山东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编委、《明清论丛》主编。

已出版学术专著11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皇帝制度》、《康雍乾三朝史》、《明清帝王兴衰录》、《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等；《管窥集》即是60余篇论文中选出有关明清史内容28篇汇集而成的。主编的大型多卷本《清朝通史》（十四卷600万字）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清朝通史著作。曾获美国基金会和日本海外研究基金赞助，赴美国、日本、韩国讲学和合作研究。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著作和论文多次获部、省级奖励。

出版说明

故宫博物院以丰富、精美、极具研究价值的馆藏文物，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明清宫殿建筑群闻名于世。然而，更令人注目的是，活跃在学术研究领域里成绩卓著的众多专家学者。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故宫学人，继承了老一辈学者马衡、唐兰等先生的优良学风，踏实工作、潜心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为更好地推进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水平，为更好地展示故宫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

“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编辑要求暂定如次：

一、收录范围。本文库收录我院具有正高职称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性论集。

二、编辑方法。本文库收录的论文集的篇目由作者自选，经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定稿。

三、文稿容量。每集 30~40 万字，黑白插图不超过 150 幅。

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1 年 9 月

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倬云	朱诚如	朱家溍	孙关根	杜璘松
李辉柄	耿宝昌	徐邦达	徐启宪	单国强
张忠培	杨 新	杨伯达	郑珉中	聂崇正
萧燕翼				

主 任：朱诚如

副主任：萧燕翼
孙关根（常务）

目 录

上 编

1. 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与民族融合问题研究 (1)
2. 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18)
3. 明末辽东“弃地”案考实 (27)
4. 明代辽东开原的民族贸易市场 (33)
5. 清入关前对辽东汉区统治探微 (39)
6. 论努尔哈赤时期的“满汉一体”化政策 (52)
7. 皇太极处理满汉民族关系的政策 (60)
8. 代善在两次争嗣中的作用评价 (65)

中 编

9. 清康雍朝宫廷内部矛盾与皇嗣制度改革 (77)
10. 乾隆建储与训政述评 (91)
11. 嘉庆朝整顿钱粮亏空述论 (104)
12. 嘉庆朝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历史考察 (145)
13. 评鸦片战争中的道光 (161)
14. 康熙年间台湾的进一步开发 (186)
15. 清代前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迟缓原因探索 (193)
16. 论鸦片战争前农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 (202)
17. 清前期关内外人口流动及其影响 (209)
18. 清王朝的封禁政策及流民对辽东的开发 (217)
19. 清代辽东海运业的发展及其影响 (225)
20. 康雍乾时期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 (232)

21. 清代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部战争述评 (245)

下 编

22. 论清前期历史走向 (252)
23. 论明代洪武年间的封建专制统治 (261)
24. 明代辽东军屯与军丁的反抗斗争 (269)
25. 明辽东都司二十五卫建置考辨 (279)
26. 论皇权 (289)
27. 一本简明而富于创见的清代史
——评郑天挺教授的《清史简述》 (338)
28. 关于清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首届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评述 (342)

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与 民族融合问题研究

明代，在我国东北广袤的疆域内，由于女真南迁、蒙古东渐、汉族北移，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兄弟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在兄弟民族错居杂处过程中，不同民族间互相接近、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渗透。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终于在女真杰出领袖努尔哈赤入居辽东之际，一个以女真为主体、又吸收了汉族等其他民族成分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族（简称满族）凝聚而成了。

研究满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女真和汉民族间的互相吸收、互相渗透的血肉联系，对于我们进一步揭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特别是满汉民族历史上的不解之缘，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本文仅就明代女真和汉族间的渗透和融合的角度来探索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至于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不是本文的议题，恕不赘言。笔者管见，尚祈同志们批评指正。

—

1635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皇太极庄严宣布：“夫珠申之号，乃席比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①自此，满洲才正式作为民族名称载入中华民族史册。

但是，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历史却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满族脱胎于明代的女真。而女真是我国境内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秦的肃慎，两汉的娄挹，北朝的勿吉，隋唐的靺鞨。辽、金、元时均称女真（史书讳辽兴宗耶律宗真，故至明时一直称女直）。女真及其先人长期以来一直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为繁荣祖国的文化、创造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女真和汉族等兄弟

民族一起生活、繁衍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共同吮吸中华民族这个慈母的乳汁而成长、壮大。

明代，女真各部散居于东北广大地区。明廷因其部落，先后设置了380多个卫^②。任命部族首领为卫所指挥、镇抚，使其“俾仍旧俗，各统其属”^③管理本部族的事务。这样，由明中央政府正式任命，并给予诰印、敕书、冠带、袭衣的部族首领，就成为明中央王朝在女真各部实行统治的代理人。这就从法律形式上肯定了明廷与女真诸部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明代女真主要分三大部，即建州、海西、野人女真。明初，三大部女真人都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绥芬河流域。由于历史上的渊源，以及本部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因为不断地受到强悍的野人女真的侵害和瓦剌东移的压迫，建州、海西女真开始了向汉民族聚居的辽东周边地带流徙。建州女真自牡丹江、绥芬河流域迁到图门江流域一带，辗转迁徙，最终于正统年间经明廷允许迁到与辽东汉区紧邻的浑河、苏子河流域一带。这里既有“林木障天，晴昼如晦”的深山老林可以“持险负固”^④，又有一块块肥沃的小块盆地（东北地区称为甸子）适于耕种。此处群山对峙，威远遐迩，确实是形胜之地。因此，建州女真在这里停止了迁徙的步伐，开始生聚蓄积，并与辽东汉区人民进行更加频繁的经济文化的交往。这里，就是日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龙兴”发祥之地。海西女真也几经迁徙，于嘉靖年间最终定居于开原东北至辉发河流域、松花江上游一带。至于野人女真中的大部分仍旧踞在黑龙江中下游直至东海岸一带，女真各部就散居在东北广阔的大地上，他们与流落在那里的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广大人民一起披荆斩棘，辛勤地开拓着祖国边疆的每一寸土地，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

随着建州、海西女真的南迁，女真人和汉人间的接近和交往就日益频繁起来。越是接近辽东汉人聚居区，这种互相接近、互相渗透就越加频繁。最终与汉人只是隔墙（指明辽东边墙）毗邻。一堵败垣，隔不断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向，许多汉人或因逃亡、或被掳掠流落到女真各部；同时，女真各部也有许多女真人纷纷要求移居辽东以至京师及关内各地。明中叶以后，辽东边墙内外已形成南北人口对流的运动，汉人和女真人更加广泛的错居杂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整个“白山黑水”之间、辽河平原上下，以至广阔的东北大地已成为一座民族渗透的大熔炉。满族共同体就是在不同民族间互相渗透中凝聚、形成、发展和不断扩大的。

自明初开始，就有不少汉人逃亡到女真各部。这些人或系“避差操罪犯逃窜者”^⑤，或为生活所迫越边谋生者。因为明代的差役本来就十分繁重，“卫所丁差有边夫、局夫、垛军、买马等项，事繁差重”^⑥，加上“辽东近城各卫膏腴田地多被卫所官员富豪占（据）”，而卫所军官“多不恤军士，侵克月粮”^⑦。如此肆意盘剥、鱼肉军丁的结果，使军丁、舍余或零散或成批地逃到女真各部。宣德年间，军卒“畏避屯戍，潜奔虏营”多

有发生。明宣宗派遣官吏率军卒去松花江造船运粮,因为距内地太远,物资转输十分困难,加之军吏的肆虐,军丁不堪其苦,结果“逃入海西诸部者,已有五百余人”^⑧。正统年间,辽东人马把连等三十八户越边到建州女真地区谋生,明政府派人前去追索,“把连等皆匿海西,准取回阿剌孙等十三户八十人”^⑨。此其荦荦大者。零散逃亡者不可胜计,如永乐年间就有不甘军吏欺压的“军卒二人,逃到海西二十余年”^⑩。因犯罪逃亡者,如天顺年间辽东汉人刘八当哈“因盗马事露畏罪奔建州”^⑪。上述情况说明,明前、中期越边逃亡到海西、建州的辽东人已不在少数。

到了明代后期朝廷日益腐败,宦官擅权舞弊,税监充斥各地,骚扰地方。“辽左群奸互构、税监庇恶匿赃”^⑫,以致辽民怨声载道。继之又“雨水风虫、相继为灾”^⑬,屯田制度日渐堕毁,以致辽东“刍粟空竭,人马倒死相枕藉”^⑭,天灾人祸逼得辽东广大军民走投无路“至欲顺虏逃生”^⑮,甚至有些辽民“则宁归建酋(即建州女真),不愿归于中国(即明朝)”^⑯。而当时女真一方却又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建州女真自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十分注意招徕汉人,“以民(指汉人)为奇货而潜招之”^⑰,致使“惧罪脱逃之人,俱以奴寨为窟穴”^⑱,努尔哈赤并“特筑一城居之,号曰蛮子城”^⑲。努尔哈赤入居辽东之前,宽待、招徕汉人的政策,对明代辽东的边防起了销蚀和瓦解作用。致有“合营男妇数千北走”^⑳,欲逃往建州女真。万历三十四年,李成梁等将辽东周边部分屯堡后撤时,原住辽东边地“鸭绿关外,鸭绿江以西,宽奠以东”^㉑一带的汉人中,“强壮之人大半逃入建州”^㉒,万历年间辽东督抚梁梦龙承认“自灾虏频仍,军民逃亡者半”^㉓,而边吏张涛已看出“建州富殖,辽人久为所有”^㉔,致使当时的巡抚山东御史翟凤坤不得不发出“我辽民以役重差烦,至于无可奈何,愿随之(指女真)去,将来之忧方大耳”^㉕的感叹。

除了越边逃亡而移居女真的辽东汉人外,女真各部还掳掠了大量的辽东军民。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女真贵族需要补充大量的劳动力,辽东汉人就成为其主要来源。他们或系女真人入境抢掠所掳,或系“境外多物产,如貂皮、人参、材木、鱼鲜之类,人(指汉人)图其利,往往越境而取之”^㉖以致被掳。据亲自到过女真人居住区的朝鲜人说:“野人(指女真人)剽掠上国(指明朝)边氓,做奴使唤,乃其俗也。”^㉗除掳掠一般“边氓”而外,也掳掠辽东“军丁以为奴仆”^㉘。可见当时女真各部掳掠汉人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就其数量来说也是很惊人的。仅以建州女真为例,见诸中、朝两国官方史乘《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自1422年(永乐二十年)到1451年(景泰三年),其间约30年,自建州女真脱逃到朝鲜,再由朝鲜政府转解而回的辽东人累计达1003人^㉙;自建州女真直接“刷还”回辽东的累计达368人^㉚;明廷派遣官员直接追索回566人^㉛;总计被掳而回1937人。其中不排除有少量的其他民族人,但绝大部分都是汉人,这一点是无疑的。而当时建州三卫女真“(李)满住(建州卫)管下一千七

百余户，充尚（即童仑建州左卫）、甫下吐（即不花秃、建州右卫）管下共六百户”^②，累计共 2300 户。以 2300 户的建州三卫仅 30 年间就从中脱逃出被掳辽东人近 2000 人，几乎接近每一户女真家庭中逃脱出一个辽东人。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况且能够脱逃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以平均值计算，建州女真每户中拥有一至二名辽东汉人奴隶，大概是可能的。

为了证明这一推断，我们还可以列举当时其他女真家庭中拥有奴隶的情况作为佐证。1433 年（明宣德八年）女真人林哈之妻说：“我家奴婢六口逃去。”^③1473 年（成化九年）女真人李阿堂可说：“率居唐人二名，年前六月逃去。五六人在，又恐亡去。”^④这两户都是拥有六七名奴婢的女真人家庭。明中前期女真人的奴婢中主要是汉人，因为“野人（女真人）之俗，不相为奴，必掳汉人互相买卖使唤”^⑤，其中也有少量的朝鲜等其他族人。这两条资料说明，当时在建州女真人户中超过我们推断的平均值一至二名奴婢的还不在少数。

至于海西女真这一时期掳掠汉人的情况，尽管没有确切的史乘可考，但根据 1443 年（正统八年）锦衣卫指挥金事吴良的奏书中说“臣奉命使海西，见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指汉人）”^⑥，我们可以推知海西女真人中拥有汉人奴隶并不亚于建州女真。

迨至明代中后期，掳夺汉人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1541 年（嘉靖二十二年）女真人袭击爱阳堡等处“掳去军人不知其数，沿边三、四堡皆空”^⑦。万历年间，仅万历十二年九月至万历十三年九月一年时间“辽镇招徕夷奴归人一千四百八十二名”^⑧。据《明实录》自隆庆元年到万历十四年所载，这 20 年中累计招还被掳人口达 8000 多人^⑨。能够招还的当然只是被掳人数中很少的一部分，可见当时被掳汉人数量之多。努尔哈赤建后金之后，1618 年（天命三年）攻掠抚顺、东州、马根丹及其所属台寨堡，一次就掳掠“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⑩。时明辽东诸生李贡有诗云：“赤子（指汉人）半为其（指女真、靺鞨）所虏”^⑪，反映当时汉人大量被掳掠的情况。

总之，当时逃亡和被掳汉人的数量是很多的，所以到 1619 年（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时，被女真人所俘的朝鲜人李民奂亲眼看到“自奴酋（指努尔哈赤）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当时的“者片（即汉文献之界凡）城外，汉人男女络绎往来者片，半于胡”^⑫，可见汉人在女真人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了。

这些大量逃亡和被掳汉人来到女真地区，他们不仅杂厕于女真部民之中，而且渗入到每一个女真人家庭中，成为女真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绝大多数的被掳汉人都与女真人同居共食，组成一个混合家庭，请看下面两个这样的家庭：

1475 年（明成化十一年），汉人阿家化说：“俺年十四岁，为建州贼松古老等所抢，随住其家，松古老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唐女二人。”^⑬

1465 年（成化元年），汉人卖土说：“吾名卖土，父尚阿赤原系辽东人，为建州野

人汝弄巨所掳，而奴使之，吾亦生长其家，以所弄介（系邻部落女真人——作者注）女子舍豆为妻居之。”^④

从上述两个被掳汉人所在的女真家庭情况可以看出：阿家化被松古老掳后，一直“随住其家”；卖土被汝弄巨掳后“亦生长其家”。无疑，他们是女真人家庭中的一部分。“唐女二人”显然也是松古老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家庭中，女真人、汉人共居一室，“四壁之下，皆设长坑（炕之误），绝无遮隔，主、仆男女混处其中。”^⑤当然，虽共居一室，满、汉主仆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但两个民族的人共居一室，从生产技术到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必然会互相影响，互相取长补短，天长日久，必然融合为一。

还有一些越边汉人，在女真地区“男婚女嫁，累代而居”^⑥。他们以户的形式插花错居在女真人的村落中，有些甚至单独构成一个小村落。嘉靖年间就出现“越边唐人之居者已成村落”^⑦。

到了万历年间，由于八旗制度的创建，使得女真和汉族间的互相渗透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

八旗制度是女真人的杰出领袖努尔哈赤亲自创立的一套较为完整、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他把以建州女真为主而聚集起来的族别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相异、制度悬殊的各族人民，用八旗制度统一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耕猎为民，战时披甲为兵，“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乎旗者皆可为兵”^⑧。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就把他始创时每牛录“五、七名或十数名，或三、四十名不等”^⑨的牛录制，正式确定以每牛录三百人，置一牛录额真（汉译佐领）为制。其后“归附日众”，又于1615年在旧有牛录制度的基础上，创立八旗制度。把女真人、蒙古人、汉人的所有户口都一起混合编入八旗中去。这样，每一个旗内都是几个不同族别、不同地区人的聚合，都按同一个政令进行管辖，并且“共同劳动、同出同行”^⑩。八旗组织密切了不同族别人民之间的关系，使各民族之间互相接近、互相渗透。在统一女真各部和征服辽东的过程中，八旗的队伍不断地扩大。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在海西女真的叶赫部被兼并后，后金政权的辖境“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⑪。在这个广阔区域内的女真各部以及汉、蒙等各族人民都统统被编制在八旗制度之下。在战争中所掳汉人亦往往根据需要，立即被编充八旗兵丁。如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攻掠抚顺城后，就曾将“所掳唐人千余名，则即削其发，服其胡服，以为先锋”^⑫。当1619年满、汉、蒙等各民族的八旗兵丁在界凡集会时，朝鲜人李民奭曾目睹盛况：“观其所聚会者，六镇藩胡（图门江之女真）、忽温（即扈伦）、汝许（即叶赫部）、于知介（即窝集部）、蒙古、唐人……皆是乌合，而无不结为心腹，此必奴酋有笼络之术也。”^⑬可见，入居辽东之际，已经聚结的女真、汉、蒙等各民族的人，以八旗制度为纽带，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居住地域。

从明初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人居辽东这二百多年中,不仅大量汉人生活在女真人地区,亦有大量女真人通过各种途径移居到辽东等地;还有一些女真人因朝贡、贸易而来往辽东汉区,在汉区甚至汉人民户中作短期的驻留和寄宿;而辽东北至开原,南到鸭绿江几百里长的地带,边墙内外的女真和汉族人民错居接壤,更是过往甚密。所有这些都是汉人和女真人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另一重要方面。

辽东的辽阳,开原是明一代女真人内移聚居最多的地方。“河东土腴人稠为全辽根本,故国朝建司于辽阳”^⑤,所以辽阳成为明廷在辽东的统治中心。除了成百上千的各民族的朝贡及来往商贾而外,还安置了大量要求内迁的女真人等。早在洪武十九年,明太祖为了安置来辽东的“高丽、女直来归军民”^⑥,特命于辽阳设置东宁卫。以后历代都有很多要求内移的女真人被安置在东宁卫居住。东宁卫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卫分,其中主要是女真人,亦有部分朝鲜人和少数汉人。汉人系“辽东军人多有畏卫苦累,私投东宁卫者”^⑦。因为东宁卫分是以女真人为主的卫分。所以努尔哈赤入居辽东时说“东宁卫的国人,原是我国人”^⑧。辽阳除东宁卫外,尚有一正统八年自开原移来的自在州,也是为专门安置女真人而特别设置的,衙门设在辽阳城“抚安东宁卫,并附近海州、沈阳中等卫归降达官人等”^⑨。此外,卫治设在辽阳城的定辽左、中、右等卫亦先后安插不少女真人。史载,正统年间,女真要求内附的人剧增。“野人女直各种夷虏之人俱附辽东地方……辽东总兵官就于自在州、东宁卫等处城堡,安插者动以千数”^⑩。由此观之,当时的辽阳城确实已成为辽东女真、汉族等兄弟民族的聚居中心。

开原系明边地的一大要塞,是通向兀良哈及海西等部女真的惟一通道。不仅是边关的贸易中心,而且也是女真人定居的集聚点。由于其“城大而民众,物力颇饶”^⑪,女真人多乐而居之。1408年(永乐六年),明成祖因京师南京炎热,所以特命于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以处要求内迁的女真人。后来亦有不少原籍中原,甚至远及海南雷州半岛的汉人官吏商人的子孙,或因祖辈“坐事病故”,或因在辽东居无定处,经明廷允许,纷纷入自在州、安乐州“寄籍当差”^⑫。此外,卫治设在开原的辽海、三万两卫也主要是安插女真人定居的。总之,明代的开原城是除辽阳而外安插内迁女真人最多的地方。

至于辽东其他诸卫,几乎多少不等都安插了不少女真人居住。广宁卫、沈阳中卫以及南四卫的金、复、海、盖是仅次于辽阳、开原的卫分。我们仅就《明实录》所载女真人内迁的情况作一钩稽。永乐六年至景泰三年,女真人要求定居内地者,除部分安插京师外,皆安置于辽阳、开原居住,亦有一两例安置广宁的。景泰三年正月以后至成化年间,要求于辽东居住的人骤增。由于辽阳、开原两处人满为患,加之正统十四年到景泰初年,女真劫掠辽东,引起了明廷的警惕,所以此间几乎大都安插在辽东半岛的南四卫居住,间或亦有个别安置于广宁的。自成化以后,人数日多,《明实录》对女真人要求内迁情况一般不作记载,其详情已不可考。总之,至明中叶时,据估计辽东直辖卫所的

居民人口中,汉人占十分之七,高丽人和归服的女真人占十分之三^⑤。据笔者接触的资料来看,这一估计是可信的。这说明定居辽东诸卫的女真人数量已是十分可观了。

这些要求到辽东等地居住的女真人,一次少则一、二人,多则几十人,有许多女真人合家迁居。1451年(景泰二年),“海西弗朵秃河等卫女直官舍二十九人挈家来归,愿居辽东边卫自效。”^⑥甚至有“率其家人与其姻媾”^⑦。“以父子兄弟叔侄之亲牵引归附”^⑧来辽东居住的。从卫指挥、千百户、所镇抚到舍人、家丁,各种身份的人都有。其要求内迁的原因和目的亦各有别:或“以其地缺食”^⑨;或“以其先因达贼(指鞑靼)杀溃,至是来归也”^⑩;更多的理由是为“愿居边卫自效”。其实不少是仰慕汉文化,贪图辽东汉区的物质生活而来的。女真人自己说“以中朝(指明朝)政宽赋轻,民皆愿居”^⑪,未必尽然也。

明廷对女真人的安置十分重视,一再指令地方有司妥为安置,依例“给衣服、彩巾、房屋、牛羊、食米、床榻、器皿等物”^⑫,并“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猎,岁给俸如其官”^⑬,据1417年(永乐十五年)辽东总兵官刘江奏“每年安乐,自在二州寄住挾官俸粮,岁月浩大”^⑭。说明为了接待这些女真人,明廷确实不惜工本。此外,内迁辽东的女真各卫首领,明廷还“人给卫丁一名,愿出塞外探亲者听(便)”^⑮,并享有“例得免差”^⑯的特权。明廷“待东宁卫人特厚,有军役人月给银五钱,粮二十斗,家有十人而一人从军,则余皆无役”^⑰。明廷还“在辽阳自在州建学宫”^⑱发展民族文化。甚至还有不少女真人被明廷任命为重要官吏,如海西女真人亦失哈,多次以明廷钦差太监的身份出使奴尔干都司及镇守辽东,是辽东地方最高军事官员之一,永宁寺碑上领衔题名第一人就是亦失哈。总之,种种优厚的生活待遇和甚至一般汉人官吏都享受不到的特权,吸引着广大女真人,特别是女真各部的首领。

除明廷直接安排居住辽东诸卫的女真人外,还有一些女真人是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入居辽东的:(一)有不少沿边居住的女真人采取“取保寄住”^⑲的办法长期定居于辽东;(二)一些女真人以到汉人家中佣工的名义长期居住辽东。建州女真王杲部与明廷绝市贡后,“当是时,杲所部诸酋皆以绝市贡故窘困,往孤山(系沿边明军驻守堡城之一)为雇工,庶自给。”^⑳连部落首领都因生活窘困,竟去汉区为雇工,可见一般贫困女真人往汉区做雇工当为常事;(三)还有一种情况,即因部落战争失败而投奔汉区的。万历年间,海西女真王忠、王台部被建州女真吞并后,其“后裔居中国附塞上袭冠带者为多”^㉑。凡此种种,都说明女真人流入辽东汉区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此外,因为辽东是女真人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所以辽东的边关等地来往驻留或寄宿的女真人很多。当时女真人朝贡、贸易队伍十分庞大。天顺年间,朝贡队伍“络绎不绝,动以千计”^㉒。为此明廷规定“建州、毛怜等卫许百人。海西兀者等卫许三、五十人”^㉓。而实际上后来已远远溢出限定的数额。建州等“以成化六年以前,各卫入贡